

无党派人士:心系家国,兴我中华

全国政协委员 高洁



日前,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开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全国政协委员高洁讲述了无党派人士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心一意跟党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发挥重要作用的故事。



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左三为郭沫若,左五为李达。

无党派人士的历史发展沿革

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特有的政治概念,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其称谓和实质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也彰显了无党派人士不同阶段心系家国的情怀。

第一阶段,称为“社会贤达”。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这是首次将无党派人士称之为“社会贤达”。有9位人士以“社会贤达”身份出席了旧政协协商会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后,社会贤达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郭沫若、李劫尘等人反对内战,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莫德惠、王云五等人则依附于国民党,并因此参加了伪国民大会和伪国民政府,败坏了“社会贤达”的声誉,致使许多民主进步人士对这一称谓产生了极大反感,不愿再以“社会贤达”冠名。

第二阶段,称为“无党派民主人士”。1948年5月5日,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在发给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的致电中,为了与以往的“社会贤达”相区别,首次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筹备新政协时肯定并采用了这个概念,1949年新政协会议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李达、董必武(于力)、符定一、欧阳予倩、洪深、吴有训、王之相、丁燮林、周谷城等12人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被沿用。

第三阶段,多种称谓并存。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老一辈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渐减少。新一代无党派人士无论从社会基础还是成长经历来看,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于是出现了多种称谓并存的局面,比如无党派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无党派知名人士、无党派代表人士、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等。

第四阶段,称为无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已经不能反映新时期无党派人士群体的现状,且由于有些称谓不够科学、准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战工作的有序开展。针对这种情况,2000年,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加强新时期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意见》,正式规范了对无党派人士的称谓,统一使用“无党派人士”这个概念。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无党派人士这个概念。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政协章程修正案,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改称无党派人士界别。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无党派人士的概念进一步作了界定,即“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这为切实做好无党派人士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为充分发挥无党派人士作用指明了方向。

无党派人士发挥的重要作用

无党派人士从其产生之初就承担起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使命,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民主革命时期,各界人士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格限制,许多仁人志士只能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单枪匹马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如郭沫若、马寅初、李达、符定一、吴耀宗,等等。他们凭着自己的社会声望和感召力,影响和带领着一大批民主人士投身民主运动。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党派人士矢志不移,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利用自身的影响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改革开放后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不遗余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而奔忙。广大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6月,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国号,最终被采纳,正式写进了新中国的建国大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政治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从郭沫若、程思远、巴金等无党派代表人士担任国家领导人,到一批又一批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权中履职尽责,在国家事务中参政议政。他们遵循“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原则,参加国家政权参与

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优势作出重要贡献。

经济方面,不少无党派人士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卓越成就,如经济学家马寅初立足新中国实际,提出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提出切合实际的“十个科学”思考;林毅夫自主创新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植根改革开放实践,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

无党派人士还利用自身的海外关系优势,在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积极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密切关注民生问题,积极投身改革的浪潮。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许多无党派人士针对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政协会议上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和提案,直接促成了相关政策的出台。

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

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1941年,李鼎铭作为陕北开明绅士,当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政府副主席。在参政议政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精兵简政议案。毛泽东对此亲自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继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李鼎铭还提出了“三三制精神”这一概念,他认为,“三三制”精神主要包括照顾各方、顾全大局、自我批评和善于协商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精诚团结、民主合作。

郭沫若领导文化大军。1938年12月,郭沫若抵达重庆,在众多社会团体中负有重任,其中最重要的职务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汇聚了一大批进步文艺界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开展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种进步文艺活动,宣传团结抗战,推动了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带来了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周恩来说:“在连接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顽固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程思远致力两岸统一。程思远在担任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积极宣传和统一的意见和主张。他强调:“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要只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要寄希望于台湾同胞。”他想方设法和台湾各界友好人士保持联系,还经常自费接待台湾客人,耐心地解释有关的方针政策,呼吁台湾各界人士响应祖国的召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共同努力。在担任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他对于促进提案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就如何发挥委员积极性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展对外交流交往多次提出建议。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20世纪60年代,发现天然杂交稻株表现出明显的杂交优势后,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袁隆平开始了他的研究。成功实现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强优势杂交水稻。1995年,难度更大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大面积推广。后来,袁隆平又提出研究兼有“三系法”和“两系法”优点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此后,中国杂交水稻技术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拥有科研、生产和推广的绝对优势。国际上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著名的无党派人士中,还有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徐悲鸿,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人民作曲家巴金,还有钱锺书、杨绛夫妇……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他们心系家国大公无私的奉献永载史册,他们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的如磐初心历久弥坚、世代相传。

从付梓到获奖

经过一年多的修改,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这部历经千辛万苦的小说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书名由《罗霄山的奔流》改名为《浴血罗霄》,了却了老将军近半个世纪的心愿。

《浴血罗霄》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浴血罗霄》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诚如夏衍所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史、我们的军史还有许多空白点。在这部《浴血罗霄》中虽没有细写,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脉络……这样的题材,只有身经百战、身临其境的人,才能写,才能写好。”著名作家周而复评价《浴血罗霄》时写道:“这是一部中国的《铁流》,比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内容更加错综复杂,气势也越发恢宏壮观……是红军真实生活的写照,是一部悲壮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的画卷。”

1991年春,《浴血罗霄》获得茅盾文学奖荣誉奖。3月29日,80高龄的将军和当代作家刘白羽、路遥等一起走上领奖台,一时被盛传为文坛佳话。

文韬武略写春秋

——萧克和他的《浴血罗霄》

雷克昌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萧克在上将中排名第一,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能诗善书,上战场时能拿枪去击退敌军,解甲归田时能提笔创作。《浴血罗霄》让他成为唯一写过长篇小说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开国将军。

写中国式的《铁流》

1926年春,萧克考入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第二期(后归黄埔军校)。毕业后,正值北伐战争开始。从小立志征战沙场、报效祖国的萧克以请假探亲为名,到湖南去追赶北伐部队,被分配到叶挺部71团3连当了指导员,从此走上了革命生涯。

1934年8月7日,萧克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团长,在长征途中,他弄到了一本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

《铁流》,并一口气读完了。《铁流》讲的是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书中塑造的俄国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令萧克激动不已,称赞这本书是“一部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

萧克觉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影响也更深远。他经历的战争,远比《铁流》里的要复杂和精彩得多。“我为什么不能写一部中国式的《铁流》呢?”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决定自己写。

经过构思,萧克准备以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罗霄山脉红军一支小游击队伍成长的历程为故事主线,以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

勤修改数易其稿

萧克于七七事变前夕开始动笔,但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留给他创作小说的时间更少了,于是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写。他用于写作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夜晚,或敌机轰炸躲防

空洞的间隙。遇到部队短暂的休整,他更是抓住时机一写就到深夜。

到1939年10月,萧克前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小说20多万字的初稿,他将小说命名为《罗霄山的奔流》。1942年,他又把小说给当时《晋察冀日报》的主编邓拓看,请他提提意见,邓拓建议萧克再多写点,把熟悉的东西都写进去,于是他又把小说扩充到了40多万字。随后的四五年里,萧克又做了多次重大修改,但他还是对自己的意犹未尽感到不太满意,从未拿出来示人。

直到1985年底,萧克从繁忙的工作中退了下来,这才下定决心,闭门谢客,再次修改这部小说。他在寓所门前挂上一副自己撰写的对联:“雕虫半世纪,今再操刀,告老不惜老;戎马60年,乐得解甲,赋闲更难闲。”他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原稿,一丝不苟地修饰,不放过一个错别字甚至标点符号。为了写出真情实感,他还专门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走了一趟。



陈寅恪出考题

崔鹤同

1932年,陈寅恪受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刘文典之请出国文考试试题。

他为入学考生出的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另加对对子,题目有三:“孙行者”“人比黄花瘦”“少小离家老大回”;为二三年级转学的学生出的对子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为研究生考试出的对子是“墨西哥”。此举引起舆论沸腾。某生问题后大表不满,以“我去也”对“孙行者”,下注“老子不考了”以示抗议。某报以北平城东一闲名为“清华园”的浴室来调侃此事道:“东城有一清华园,西城有一清华园,梦游要仔细,莫把澡堂当学堂。”

为此,陈寅恪在《清华暑期周刊》第六期上发表《答记者问》,又撰《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释出题含

义。33年后的1965年,陈寅恪还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补写后记,以申前义。他认为:“(甲)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道分别虚字及其作用……(乙)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丙)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丁)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思想条理。”

作家端木蕻良是当年的考生,几十年后他回忆,“少小离家老大回”,他对了“寒花未落桐叶长”;“孙行者”他对了“花和尚”。他认为这种考试方法检验了他的语言能力;于同年考清华的周祖谟和张政烺,当时对“孙行者”的对子都是“胡适之”,陈寅恪阅卷时大为赞赏,传为佳话。周祖谟后为北大教授,张政烺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古文字、古文献。



钱伟长重视红色文化

周二中

2022年9月17日,《董亦湘传》首发暨赠书仪式在江苏常州举行,该书的作者为常州市名人研究会副主席、董亦湘研究委员会会长肖飞。在首发式上,肖飞讲了自己任董亦湘生平资料时偶遇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事。

董亦湘是江苏武进人,当年曾在上海大学社会系任教,讲授社会发展史。为了广泛收集董亦湘的有关资料,2006年3月20日,肖飞一行人来到了上海大学图书馆。

钱伟长是上海大学校长,当时已经是94岁高龄的老人了。钱老是位极具家国情怀的长者,他得知有人来查找董亦湘的资料,很感兴趣,说要去见来的人。就这样,肖飞在上海大学图书馆见到了慕名已久的钱伟长。钱老坐在轮椅上,精神状态很好。肖飞说自己来自江苏常州,钱伟长一听,精神一振,说常州啊,老乡啊。钱伟长是江苏无锡人,历史上的无锡县曾属常州府管辖,所以钱伟长认为无锡、常州是一家。钱伟长的父亲钱铨与叔叔

钱穆都曾在常州府中学堂(今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就读。更让肖飞感动的是,钱伟长非常了解董亦湘。钱老说,董亦湘是老革命家啊,你们要好好宣传他的事迹。

接下来,钱伟长将上海大学的几位领导叫到身旁,说明宣传董亦湘的重要性,嘱咐他们要认真配合肖飞一行收集资料,并开玩笑地说:“这是我的小老乡,可不能怠慢了!”几位校领导连连点头,说一定遵照老校长的指示办。钱老一听,和大家都会意地大笑起来。此后,学校专门派人帮助肖飞一行查找相关资料,还热情招待。

肖飞说,因为种种原因,虽然董亦湘并不为世人所知晓,但他先后介绍了恽雨棠、陈云、张闻天、孙冶方等人入党。1922年,董亦湘还在无锡创建了中共无锡第一个党支部。这样的革命先行者不该被遗忘。

肖飞向钱老表示,自己一定多收集董亦湘的资料,将董亦湘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钱老听了很高兴。

肖飞说,自己创作《董亦湘传》,就是为了兑现当年对钱老的承诺。



高晓声做竹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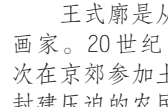
周星

“文革”初期,著名乡土作家高晓声怕挨斗,就躲在家里同左邻右舍的七八个孩子一起学做竹匠。高晓声编得模像样,名噪一时。接着,他又改进了样式,开发出了新样品,把小篮编得更精致了,就像一件件工艺品,他心中多了一份小小的成就感。

村上有个人会做蓑帽,蓑帽竹编的眼子与小圆篮差不多,高晓声便向他请教。那人指出编篮的难点在于收口,高晓声顿时觉得想要学会这个手艺不拜师是万万不行了。正好三河口乡东姚村的竹匠善编蓑帽、小圆、筛子,于是,高晓声来到东姚五队陆炳兴家里,见他偷偷在猪圈屋里编竹篮,就问起竹篮副业的情况。陆炳兴说:“做一只大的黄糊篮至少可以卖2元钱,一只中黄糊篮1元5角,小的也能卖1元钱,绝对超过一天做工分的收入。一个人一天至少可以做十只以上。”

高晓声听后非常高兴,立刻就拜了陆炳兴为师,虚心向他请教,两人还成了好朋友。很快,高晓声的小篮编得模像样,名噪一时。接着,他又改进了样式,开发出了新样品,把小篮编得更精致了,就像一件件工艺品,他心中多了一份小小的成就感。可是,高晓声还是不满意,又跑到横山桥区“偷师学艺”,多看了几眼心里就有数了,回家就动手编成了“横山桥篮”的大草篮子。这些篮子编得结实又好看,深受大家欢迎,高晓声就在暗地里买卖,或者以物换物,换点鸡蛋等生活物品。

做到后来,高晓声的双手像裹了铁皮一样布满了老茧,随便碰在哪个刀口上都不会见血。村上好些人也开始跟着高晓声学竹编,成为了他的徒弟。高晓声靠着编小篮和做蒸架这些手工活,度过了那个特殊的年代。



王式廓与《血衣》

付裕

王式廓是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画家。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多次在京郊参加土改运动,并对受到封建压迫的农民遭遇产生强烈的同情和共鸣。于是,开始构思《血衣》这部作品。

在采风过程中,王式廓曾尝试勾勒过很多草图,结果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式廓在土改资料中看到一位农民拿着沾满鲜血的衣服控诉地主的罪恶,突然迸发出创作灵感。由此,血衣成为画面中最为重要的关键点。于是,王式廓开始艰辛的创作。

通常意义上来说,素描被认为是习作,但是,《血衣》这件作品却是在新中国美术史中唯一一件用素描的方式来表现重大主题的作品。

在《血衣》这件作品中,王式廓用素描完整地表达了宏大主题,揭露和控诉了封建制度的历史罪孽,生动表现千百万农民为打破千年封建枷锁而掀起的土地革命风暴。这幅画以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绘画艺术中的经典之作,其创作手法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艺术创新和探索之一。

1972年末,王式廓开始创作真人比例的油画作品《血衣》。然而,1973年5月22日傍晚,王式廓因劳累过度昏倒在画架旁再没醒来。大型油画作品《血衣》因王式廓突发脑溢血去世,最终成为一部绝唱。王式廓创作《血衣》过程前后历时23载,其中不仅包括为《血衣》创造的37幅人物造型素描系列、历年大量素材素描作品,以及1959年最后完成的大型素描作品《血衣》,还包括1959年后陆续创作的几十幅油画肖像系列和未完成的大型油画《血衣》,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